

---

---

# 复交以来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的贡献\*

张建立

**内容提要：**里千家是日本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民间茶道文化团体。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里千家顺应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心愿，率先垂范派遣“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开启了中日青少年茶文化交流的新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年来，里千家派出过百余次访华团，几乎每次都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里千家通过开展中日茶道文化交流，发挥了推动中日友好交流的文化使节作用，是“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典范。里千家常年在中国各地开展的茶道文化活动，以及由里千家与中日友好协会、中日韩三国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等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等，丰富了中日茶道文化交流的内容。

**关键词：**中日邦交正常化 茶道 里千家 文化交流 以民促官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TS971；D822.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2)04-0144-16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日间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编号：2021RBSB03)。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茶道里千家长期坚持中日友好，秉承“一碗茶中出和平”<sup>①</sup>的文化理念，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自 1979 年派出“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至今，里千家曾派出 130 多次访华团，多次受到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维护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和中国人民的尊重。1991 年，

---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① “一碗茶中出和平”（日文为“一碗からピースフルネスを”），是日本茶道里千家鹏云斋大宗匠千玄室先生自 1964 年接任里千家第 15 代家元时提出的理念，旨在通过普及茶道文化宣传和平。2003 年，已经 80 岁高龄的千玄室先生出版了以该理念为书名的专著（千玄室『一碗からピースフルネスを』、淡交社、2003 年），再次对日本茶道发展史、“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意涵及其本人在该理念下开展的国内外实践活动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探讨。“一碗茶中出和平”依旧是里千家所奉行的文化理念。

中日友好协会授予里千家第15代家元千玄室先生“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称号。1996年，千玄室先生被天津市政府授予“天津市荣誉市民”称号。2002年，文化部授予千玄室先生“文化交流贡献奖”。<sup>①</sup>2010年5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东京亲自向千玄室先生颁发了“中日友好贡献奖”。温家宝在颁奖仪式致辞中称：“今天这个颁奖仪式非同寻常。在这里见到各位日本友人，我心里很激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起重要作用的是人民，你们是中日友好的功臣。”“历史将记住你们，中日两国人民将记住你们，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sup>②</sup>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回顾茶道里千家对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所做的贡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一、50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回溯

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悠久、内容广泛的文化交流，对促进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以及经贸往来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茶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日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与平台。

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日本茶道在对中国家茶道本土化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可谓是中国两国人民乃至东亚各族人民长期友好交流的产物与象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茶文化交流同样对维护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的茶文化交流逐渐得到恢复并不断深化。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这50年间两国的茶文化交流尚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的现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清代以前的中日茶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北京大学教授滕军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该著作依据翔实的文献、古诗文、图片等，对自古到清末年间中日茶文化的交流、传播及相互影响的历史进行了详尽梳理，并从历史成因、茶文化载体、调茶法、茶具、茶文化的传承者、精神境界等方面对中日茶文化的异同进行了分析。<sup>③</sup>

① 《我向日友好人士颁发文化交流贡献奖》，《人民日报》2002年9月28日。

② 《“你们是中日友好的功臣”——记温家宝总理与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会面》，《人民日报》2010年5月31日。

③ 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年来, 两国的茶文化交流, 从最初单一的茶叶栽培技术及制茶技术交流, 不断拓展为涵盖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 其交流的内容和形式等也表现为由单一到丰富, 不断叠加、交融。如果依据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粗线条梳理的话, 大致可以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的茶文化交流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时期是中日各领域逐渐恢复交流合作的时期。顺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中日间首先从茶叶栽培技术及制茶技术方面开始恢复茶文化交流。与后来不断深化、日益丰富的中日茶文化交流相比, 该阶段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内容和形式等显得很单一, 因而很难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仅见浙江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王家斌撰写的《友谊种子——中日茶叶文化交流史话》, 不仅概述了自古以来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 还用极为简短的篇幅扼要记述了进入 70 年代中日两国在茶叶生产科技领域的交流情况。该文认为, 中国虽然是茶文化母国, 但以 19 世纪末为界, 在茶叶栽培、制茶技术等方面, 出现了两国千余年的师生位置发生转换的情况。日本在茶叶的科学种植、良种繁育及茶园科学管理方面业绩斐然, 茶叶生产实现了机械化, 制茶实现了连续自动化, 成为世界产茶国家中茶园单产最高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 日本有关茶叶产业方面的书籍杂志开始传入中国, 如《茶业宝典》《静冈茶话》《世界的产茶业与贸易》《茶的栽培》《制茶机械》《茶叶研究报告》《新日本绿茶》《新茶叶全书》等, 使得日本茶叶生产的先进经验为中国茶叶生产和科研提供了有益参考。日本茶业界也一直很关注中国茶叶生产状况, 特别是日本著名茶产区静冈县在推动两国茶叶生产及经贸往来方面表现得很积极, 多次派遣茶叶专家访华交流经验, 并赠送图书资料、采茶机及茶树修剪机样机等。1972 年至 1973 年, 中国还从日本引进了若干套用于制作蒸青“煎茶”的机械自动化设备, 并将中国生产的蒸青“煎茶”运销日本, 促进了中国茶叶生产技术的提升与中日两国的茶叶经贸往来。<sup>①</sup>

第二阶段, 是 1979 年茶道里千家首次派遣访华团至 20 世纪末。该阶段, 不仅在种茶、制茶等茶叶生产科技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深入, 少到一人、多达数十人的日本茶叶访华团连续不断, 而且开始向学术交流领域扩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日茶文化交流还发挥了部分文化外交的功能。

<sup>①</sup> 王家斌:《友谊种子——中日茶叶文化交流史话》,《茶叶》1979 年第 1 期,第 47 页。

20世纪80年代,日本积极派出茶叶生产科技领域访华团。例如,1983年6月,以佐野敏男为团长的日本静冈县日中茶业考察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人,由上海入境到访江西省,与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及江西省农科院蚕桑茶叶研究所科研人员围绕茶叶生产、贸易、消费等议题进行了座谈。<sup>①</sup>1983年8月,日本静冈县茶叶试验场副研究员后藤正访问杭州,对当地的茶树品种、茶树种植、茶叶加工等方面进行了技术考察,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交流了日本茶园施肥的生产实践经验,探讨了如何优化茶园土壤、培育香气高的茶叶优良品种与提升制茶工艺等方面的问题。<sup>②</sup>

与此同时,中日茶文化交流逐步向学术交流领域扩展,在这方面发挥引导作用的正是日本茶道里千家。1983年9月,日本茶道里千家派出以第15代家元千玄室为团长的第21次“日中友好里千家茶道文化交流团”一行65人访华。里千家访华团受到中国领导人邓颖超等的接见,并于9月8日到达杭州参观访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该所科研人员围绕中日饮茶方法、茶道精神等进行了交流。<sup>③</sup>1985年3月,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以第15代家元千玄室为团长,由日本茶道里千家茶人、茶文化史专家和茶叶民俗学者组成的“‘中国茶史’里千家学术调查团”一行九人访华,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接见,之后在福建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学术调研。该调查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福建省茶叶学会科研人员,围绕福建茶叶的起源、制茶种类、发展利用情况以及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参加相关学术座谈的都是中日茶文化界知名专家学者,日本方面有著名中国茶文化史专家、日本大阪大学中国史名誉教授布目潮汎,著名日本茶文化史专家里千家今日庵文库长筒井紘一,筑波大学教授熊仓功夫,国立民族博物馆文化人类学教授守屋毅等;中国方面有福建省茶叶学会顾问张天福、林桂镗、庄任、林心炯、叶延庠、李冬水、高章焕、林瑞勋、陈金水、李一金等。<sup>④</sup>日本茶道里千家派遣的此次学术调研访华团,可谓是中国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

① 黄奋文:《日本静冈县日中茶业考察友好访华团来江西考察》,《中国茶叶》1983年第6期,第21页。

② 振华:《日本静冈县茶叶专家来杭考察》,《中国茶叶》1983年第6期,第21页。

③ 徐立成:《日本里千家茶道代表团参观访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1983年第6期,第21页。

④ 林星:《茶是联系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一条纽带——记日本〈中国茶史〉里千家学术调查团访问福建》,《茶叶科学简报》1985年第2期,第31页。

日本茶道里千家与中国开展的茶文化学术交流，不仅仅停留在派遣访华团开展短时间交流，还着眼长远，积极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合作，通过开设茶道文化课程、接纳留学生等，培养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 年日本茶道里千家与天津商业大学合作开办了“天津商学院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不仅招收日本留学生进修汉语、京剧、太极拳、陶瓷、绘画、书法、茶道等课程，还招收中国学生学习日本料理、茶道等，截至目前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sup>①</sup>

日本茶道里千家访华，几乎每次都会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到地方参观、调研也多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会见和热情款待。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阶段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发挥了茶文化外交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入新的阶段，加之中日茶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国内茶界茶人乃至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关注中华茶文化的复兴以及中国茶产业的振兴，也越发注意到开展茶文化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1990 年 10 月 25—27 日，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杭州举办了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国及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茶文化学者和专家 200 余人参会，议题涉及茶文化发展史、茶的起源与传播、茶叶风俗、茶与健康等，其间还安排了中国茶艺、日本茶道、韩国茶礼等表演。<sup>②</sup> 此次研讨会是国际上首次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大规模学术交流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常设委员会”，并决定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此基础上，1993 年 11 月 8 日，“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sup>③</sup>，是国内第一个推动茶文化研究和发展的国际性专门组织。中国作为茶与茶文化的故乡，从此有了茶文化领域首个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也正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如此深厚的积累，才为 21 世纪以后中国与日本乃至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至今，可谓中日两国间茶文化交流全面开花的阶段。该阶段中日茶文化交流涵盖学术交流、茶叶生产科技以及经贸交流等领域，内容日益丰富、交流形式亦日趋多样化。此时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的最

① 汪伟：《商学院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天津日报》2007 年 3 月 20 日。

② 程启坤：《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中国茶叶》1991 年第 1 期，第 25 页。

③ 斯闻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在昆明举行》，《农业考古》1994 年第 4 期，第 36 页。

大特点是，参与者越发广泛，既有以日本茶道家元组织为主体推动、中日韩官民联合主办的茶文化学术交流，如以茶道里千家为主体连续举办的“东亚茶文化研讨会”<sup>①</sup>，也有中日两国茶文化专业学会间开展的学术研究，如“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与日本最大的茶道文化研究学术组织“日本茶之汤文化学会”等开展的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sup>②</sup>，还有以禅宗寺院为后援，借力著名茶文化学者、茶产地的地方政府、茶企业、茶文化研究机构及茶文化相关刊物共同开展的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如“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茶文化学术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农业考古》从1991年开始设立中国茶文化专号，将第2期、第4期辟为茶文化专号。到2006年，《农业考古》由季刊变双月刊后，则特辟第2期、第5期为茶文化专号，每期都会刊发一定的中日茶文化学术研究论文，成为促进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的恒定力量。

进入21世纪，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的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仅有以中国国内专家、学者为主，纯粹以学术研讨为目的举办的中日茶文化学术会议，也有来自两国学界、茶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专家、学者及茶文化爱好者共同参加的中日茶文化学术研讨会，而且大多将专业的茶文化学术研究发表与中日茶道表演、祈愿东亚和平的献茶仪礼等融合为一体。例如，2008年10月28—29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的“中日茶文化交流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学界、茶文化界、教育界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50多位专家、学者、茶文化爱好者与会。“此次会议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智慧的汇聚，是学者们自由发表见解的平台。这是中国茶文化学界内部的一次自我反思，为进一步的中日茶文化交流进行了专业的准备。会议对于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各自的特性及两者交流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sup>③</sup>

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中日茶文化交流由昔日单一的制茶技术、点茶技艺交流不断扩展，如今以茶为媒介的文化交流平台几乎涉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谚语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广为流传，亦足可见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以及茶文化的沉淀。

<sup>①</sup> 石艳春：《“东亚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论集200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2—418页。

<sup>②</sup> 《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研讨会在湖州举行》，《农业考古》2002年第4期，第358页。

<sup>③</sup> 王立霞：《从历史关注未来——中日茶文化交流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第277页。

茶文化发展至今,品茶已不仅仅是一项饮食活动,而是形成了其特有的将儒学、佛教、道教、神道、基督教等宗教以及哲学、伦理和美学融贯于一体,分别表现于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插花、香道、烹饪、礼仪、点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生活文化体系。2013年11月1日,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联合主办,辽宁喀左清美紫陶文化产业发展公司协办的“茶境——首届中日茶文化交流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成功举办,可谓新近中日茶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这次跨国展览分别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北京举行,旨在弘扬东亚茶文化艺术,为促进中日茶文化交流搭建平台。展览设计以“茶”为核心,对“俗”——“柴米油盐酱醋茶”与“雅”——“棋琴书画诗酒茶”、静态展示与动态表演进行完美结合,充分体现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宗旨。“此次中日茶文化交流展广泛引入了相关的多门类创作设计展品,从全方位的角度诠释了唯美自然的茶道艺术。与饮茶活动密切相关的领域有茶道用器、茶道服饰、茶桌茶椅、茶道空间等,它们均是观赏性与实用性的统一体。”<sup>①</sup>

进入21世纪,中日茶文化交流形式的多样性在茶文化外交及经贸方面也有很突出的体现。茶文化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从茶叶、茶器、建筑等有形的器物,到儒、释、道等抽象的哲理与礼仪,几乎无所不包。茶叶作为一种独具健身养生功能特色的生活物资,自古以来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加之由茶叶独特的生化特性所衍生出来的修身养性等文化功能的影响,茶文化也一直是一个维护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好抓手,对中日关系而言亦如此。<sup>②</sup>

近年来,因新冠疫情影响,茶人们一时很难面对面聚集品茶,但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依旧可以通过举办线上品茶大会来增进国民情感、促进经贸交流合作。例如,2021年8月19日,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馆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和束町日中文化交流会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巡礼世界茶文化”的在线文化交流活动,中日双方主办单位的主要领导以及俄罗斯联邦驻日本大阪总领馆相关人员在线出席。中日双方大约1400名“茶友”在线上品鉴河南信阳毛尖、日本和束煎茶、俄罗斯特色茶及中国香港奶茶,视频平台“YouTube”进行了全程直播。该活动还邀请日本大阪府日中

① 郑宁:《茶境——首届中日茶文化交流展》,《中国陶艺家》2013年第4期,第43页。

② 林坤桦:《中国“茶外交”之经验及优化路径——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探索》,《福建茶叶》2022年第4期,第9—11页。

友好协会时任理事、茶艺专家白雪梅以及和束町日中文化交流会副会长、茶园“上香园”园长冈田文利，分别对中日茶文化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参会者们反响热烈，纷纷在聊天平台、社交媒体上发帖分享品茶体验，表示茶既是饮品也是文化，更是心灵纽带。从此次“巡礼世界茶文化”带来的热烈反响看，此次茶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很好地实现了各美其美、讲好各自茶文化故事的初衷，也给中日关系增添了一丝亮色。<sup>①</sup>再如，2022年5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由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馆、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和束町日中文化交流会共同主办，以和束町政府、和束町商工会为后援的“茶文化交流 in 和束町”活动如期举行。位于京都府南部的和束町茶园已经有800年历史，抹茶原料生产量列全日本第一。双方代表在和束町茶园共同种植茶树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薛剑总领事为写有“以人民的力量共筑中日友好”字样的植树纪念牌揭幕。<sup>②</sup>可以说，正是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交流和积淀，才使得这类茶文化交流活动自然有效、深入人心。

## 二、茶道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的贡献

茶道里千家在中日茶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可以从学术交流、青年交流和家元个人贡献等视角进行概述。通过探讨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能够深入体会其为何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和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 （一）茶道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的贡献

茶道里千家推动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茶道里千家积极与中国著名高校签订友好交流协定，向高校捐赠茶室，设立面向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茶道文化课程，设立奖学金，接纳来自部分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到茶道里千家京都总部研修茶道。目前，茶道里千家已经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培养了一大批

<sup>①</sup> 申志：《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成功举办中日茶文化线上交流活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网，2021年8月23日，<https://hct.henan.gov.cn/2021/08-23/2298556.html> [2022-06-16]。

<sup>②</sup> 《五月天的一件小事——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茶文化交流 in 和束町”活动举办》，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网，2022年5月28日，[http://osaka.china-consulate.gov.cn/xwdt/202206/t20220628\\_10711349.htm](http://osaka.china-consulate.gov.cn/xwdt/202206/t20220628_10711349.htm) [2022-06-16]。



有志于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人才。

第二，自 2004 年以来，茶道里千家积极推动中日韩官民共同举办“东亚茶文化研讨会”，轮流在中日韩三国举办，由日本茶道里千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韩友好协会及中日韩一所或两所著名高校联合主办，中日韩三国大使馆及会议举办地市政府协办的形式举办。每一届“东亚茶文化研讨会”都以“东亚茶文化与世界和平”为主题，并与时俱进地设计一些关于双边关系或当时国际形势的研讨议题，邀请中日韩以及欧美国家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热烈探讨。2018 年 9 月在日本名古屋市举办了“第 13 届东亚茶文化研讨会”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东亚茶文化研讨会”备受关注、影响深远，中日韩茶文化界都很期待该研讨会能早日重新启动。

第三，第 15 代家元千玄室先生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日本茶道家元与最具权威性的日本文化名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 1983 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专著——《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首次充分肯定了陆羽及其著作《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并明确指出，“茶道之源头在陆羽的《茶经》，应该回归《茶经》来建构今天的茶道精神所当追求的理想境地”。<sup>①</sup> 1991 年，千玄室又以该著在南开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2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著作的中文译本，获得了中国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和高度评价。<sup>②</sup> 这可以说是茶道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做出的最大学术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也正是国际社会上“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文化优秀论”等最为盛行的时期。在很多场合，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论”即等于“日本国民性特殊论”“日本文化优秀论”。根据对中国知网刊载相关文章的不完全统计，自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国内学界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文章中，论述日本文化特殊模式的文章所占比重依旧很大，许多文章题目中明确冠以“日本模式”“日本型”等字样，其内容大多是通过研究日本文化特殊性来探讨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sup>③</sup> 学者们采取以今论古的逆向研究方式，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结果导致随着战后日

① 千宗室『「茶経」と我が国茶道の歴史的意義』、淡交社、1983 年、250 頁。

② 具体参见刘岳兵：《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新奉献：读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5 年第 6 期，第 138—142 页；李荣林：《中日茶道文化之比较观——读〈日本茶道文化概论〉〈《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有感》，《农业考古》1997 年第 4 期，第 343—346 页；尉海莹：《从〈《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看茶文化在东瀛的传承和发展》，《北方文学》2020 年第 5 期，第 242—243 页。

③ 张建立：《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11 年第 1 期，第 132—139 页。

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也不知不觉地以欧美文化为参照系而展开褒贬不一的评价。<sup>①</sup>具体到茶文化学术研究而言，中国的茶文化学术研究积累尚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甚至不知道中国唐代文献中早已经出现了“茶道”一词，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茶艺”概念，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才作为“茶道”代名词而启用的新词。

在各种日本文化特殊论、优秀论甚嚣尘上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在中国学界对中华茶文化尚信心不足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千玄室先生作为一名日本茶道文化传承者、一位在日本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能够不陷入这种日本文化特殊论的误区而出版《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既坚持了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又尊重历史事实、积极坦诚地肯定了唐代陆羽《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此举意义重大，对中日茶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其学术贡献理当予以高度评价。

千玄室先生在其著作中呼吁回归《茶经》来建构今日茶道理想的精神境界，其信念是非常坚定的。他不仅多次访华参加陆羽研究会的活动，而且多年来一直期盼在合适的时机能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为陆羽献茶。2013年是茶圣陆羽280周年诞辰，已经91岁高龄的千玄室先生应中方邀请，亲自率领茶道里千家第129次访华团专程参访《茶经》故里——浙江湖州大唐贡茶院陆羽阁，将亲手点好的一碗抹茶敬献给陆羽。仰望高大的陆羽像，夙愿得偿的千玄室先生情不自禁地老泪纵横，其情其景令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二)“日中友好文化交流里千家青年之船”开中日青年茶文化交流之先河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和航空业的发展，中日间人员往来越来越便利、频繁，每年数百万人次的人员往来，以及庞大的经济交流合作规模，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相比令人大有隔世之感。在20世纪70、80年代，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刚刚恢复邦交初期国民间的观望心理，中日民间交流多是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以互派“友好之船”的方式进行。“友好之船活动以旅游形式开展，不仅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发展吸引了迫切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sup>②</sup>

<sup>①</sup> 赵德宇：《战后日本文化论流变》，《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第69—70页。

<sup>②</sup> 陈茜：《1973—1992年中日友好之船研究——以到访天津的友好之船活动为例》，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页。

中日之间这种“友好之船”的交流方式，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关注，相对系统的研究仅见天津大学陈茜的硕士学位论文《1973—1992 年中日友好之船研究——以到访天津的友好之船活动为例》。据该论文介绍，“到访天津的友好之船多是由地方政府联合日中友好协会进行组织的，由当地知事或市长亲自担任团长组团开展活动。1978 年，开始有一些日本经济团体自行组织友好之船来华。此后，友好之船活动的组织者越来越多样化，除地方政府组织的外，又新增了许多来自工、商、学等领域组织的友好之船”。<sup>①</sup>

实际上，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文化界最早派遣访华团的民间团体并不是里千家，而是 1973 年 2 月访华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中日间“友好之船”这种交流方式的最初倡导者也不是里千家，而是日本兵库县知事坂井时忠。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坂井知事向中方提出派船到大陆进行“寄港”访问的请求，周恩来总理称其为“这是一次新的友好尝试”，并给予了支持。<sup>②</sup>因为日本派遣的访华友好之船参与者多为青年人，因此有时也称之为“青年之船”，但这些活动最初大多是官方组织的。而兼具“日本文化界”“民间文化团体”“青年之船”这三个关键要素者，唯有茶道里千家派出访华的“日中友好文化交流里千家青年之船”，所以称其“开民间文化界中日青年交流之先河”应该不为过。

里千家青年之船的成员主要是日本茶道里千家社团法人淡交会青年部会员。淡交会青年部成立于 1950 年 5 月，是一个以 50 岁以下的里千家茶道爱好者为会员的青年文化团体。该文化团体通过向海外派遣青年之船的方式，积极与各国开展茶文化交流。1974 年 6 月，有 418 名青年部成员参加的“第一次里千家青年之船”抵达中国香港，开展以茶为主的文化交流。1980 年 7 月，里千家第 15 代家元率领第三次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经天津上岸，到访北京、上海、苏州，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大茶会，千玄室等访华团成员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2001 年 6 月，为了纪念里千家第 100 次访华，由里千家第 16 代家元率领第九次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在中南海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茶道里千家每次派遣的里千家青年之船都是从天津港上岸，然后租用大巴车前往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茶会，邀请的参会人员不仅仅限于中国各界青年代表，还会邀请一些著名高校校长、学者以及著名茶叶专家，有

① 同上。

② 同上书，第 18—19 页。

时中国领导人也会出席茶会。例如，1980年“日中友好文化交流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茶会时，国内著名茶叶专家、茶学教育家、茶叶生物化学创始人、时任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的王泽农教授即在受邀之列。王泽农教授也是中国茶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是中国茶学界公推的“20世纪十大茶学家”。会后，王泽农教授发表感言称：“会上日本茶道最大流派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同志都讲了话，阐述了中日友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茶道是结合了中国的品茶艺术和佛学禅宗所创造的日本独特的哲学、伦理、宗教、政治、文学、绘画、书法、工艺、建筑、道德、风尚整套的传统文化，是精神上美和善的结晶。”“这次日本茶道里千家青年之船组织的日中友好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意义是深远的，为了建设美好的人类社会，中日两国人民在保卫和平、维护正义事业中应加倍努力做出贡献。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万古长青。”<sup>①</sup>

（三）茶道里千家为维护中日关系充分发挥了“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茶道里千家率先垂范，向中国派遣由家元任团长的大型访华团，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1979年11月，茶道里千家应邀派出访华团，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会见。不仅日本主流新闻媒体、茶道里千家淡交会月刊《淡交》等进行了详尽报道，《邓小平年谱》中也留有如下记录：“1979年11月6日上午，会见日本茶道著名人士、里千家第15代家祖千宗室一行。按日本的礼仪，喝了千宗室亲自沏的一杯日本茶后说，茶道在日本社会是很有影响的，也是发展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欢迎你们来访，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sup>②</sup>

在中日关系发展平稳期，茶道里千家则积极推进中日友好事业，相关内容前面已经略有提及，不复赘言。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出现低谷时，茶道里千家为维护中日关系、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尽心尽力。2001年小泉执政时期，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中日关系跌入“政冷”期，两国国民感情也出现波动。虽然中日“友好之船”的交流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茶道里千家为了促进中日青年的相互了解和增进

<sup>①</sup> 王泽农：《茶道源远 友谊流长——参加日本茶道里千家青年之船茶会感言》，《中国茶叶》1980年第5期，第1—2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77页。

彼此的友谊，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茶道里千家第 100 次访华，特意于 2001 年 6 月派遣“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第九次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里千家第 16 代家元千宗之亲自率船，作为小泉首相特使携带着小泉的亲笔信访华，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据新华社报道，2001 年 6 月 28 日，“江泽民欢迎千宗之带领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他说，世界各国的文化是相互交流的，茶道虽源于中国，但在日本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成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纽带。现在的世界交通便利，信息快捷，但仍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江泽民称赞里千家多年来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千宗之感谢江泽民主席的会见。他说：‘中国是茶道的发源地，日本很多文化都来自中国。为此，我们愿意保持和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这次是里千家第一百次访华，我们选择了乘船渡海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年轻人在渡海的过程中，亲身体验日中两国一衣带水的含义。’千宗之表示，江主席强调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使他们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他们决心与中方一起共同努力，进一步密切两国青年的交往，把老一辈开创的友好事业继承和发扬下去。”<sup>①</sup>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很多人还在观望之时，茶道里千家率先垂范积极访华；中日关系平稳发展时期，茶道里千家坚持推进友好交流事业；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时，茶道里千家则尽心尽力积极维护，发挥了“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不愧为天津市政府授予的“天津市荣誉市民”、文化部授予的“文化交流贡献奖”以及中国政府颁发的“中日友好贡献奖”获得者。

### 三、中日茶文化交流对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启示

在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尚未平息、国际局势复杂、中日关系亦面临各种困难的特殊时期，文化交流亦应在增信释疑、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回顾以往 50 年的风雨历程，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真正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避免因政治价值观存在分歧而否定中日间文化价值观的诸多相通之处，进一步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深化相互认知，重构新时代中日间文化认同，这是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茶虽小道，亦确有可观之处，强化源远流长、拥有“精行俭德”“和敬清寂”

<sup>①</sup> 车玉明：《江泽民会见日本茶道里千家访华团》，《新华每日电讯》2001 年 6 月 29 日。

“禅茶一味”“一期一会”“侘”等诸多共通之处的中日茶文化交流，亦可为解决该时代课题提供重要渠道。

现有研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间茶文化交流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梳理了茶道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的贡献，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茶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概略性梳理。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年来的茶文化交流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茶道里千家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在促进中日茶文化交流活动中的很多创新做法，均值得仔细研究和借鉴。进一步而言，通过梳理中日间的茶文化交流，不仅让我们重新确认了中日两国在文化价值上的共通性，而且加深了我们对日本茶道发展历史的了解，特别是增进了对茶道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

日本茶道可以说是在对中国茶道实施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日本茶道发展过程中，日本茶人们对中国茶道内容进行了契合其风土习俗的取舍，将中国茶道中涉及种茶、制茶等内容逐渐独立出来作为茶产业发展至今，而将中国茶道中关于饮茶方法、饮茶精神的内容等提炼升华为目前一般所谓的日本茶道。自 18 世纪以来，日本茶道被明确作为代代相承的家业传承发展至今。高质量的茶叶是日本茶道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但在日本，茶道家元既无须亲自去种茶、制茶，更不会将茶道技艺作为一种茶叶促销手段去卖茶为生。通览日本茶道发展史，茶道文化从来都不是茶产业的附属宣传物，恰恰相反，甚至可以说正是日本茶道文化的隆盛，才大大促进了日本茶叶生产的发展。作为日本茶道核心传承人的家元，可以心无旁骛地专事茶道技艺的研磨和茶道精神的提升，其所肩负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日本传统文化、传统美意识的传承者，而且要求其必须同时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以茶为媒介的新文化价值理念创造者。例如，一提起日本茶道精神，大家马上会想到“和敬清寂”这四个字，日本茶道也将其称为“四规”。其中所谓的“和”本无“和平”之意，但是日本茶道里千家第 15 代家元千玄室契合新时代和平发展的要求，对其予以扩大解释赋予“和平”含义，在继承家元之时提出了“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并付诸实践，其足迹遍及全球，积极探索与该理念契合的茶道内容范式，获得了日本民众乃至其他国家民众的广泛共鸣，大大地提升了日本茶道的国内外影响力，也间接地提升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日本茶道家元已经成为某种权威价值理念的实践者、体现者和赋予者。比如同一个茶园、同一个茶叶生产企业出品的茶叶中，获得日本茶道家元喜好和命名的茶叶的价格要远远高出其他茶叶。类似文化现象

也广泛见于日本很多产业和艺术等领域。通俗地讲，日本茶道家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高附加值的日本文化品牌。如今，在日本，茶文化已经以千利休嫡传茶道流派为核心，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茶文化产业链、茶文化共同体，其外溢效应不仅影响到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而且也成为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软实力资源。

日本茶道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和地位，既是以日本茶道里千家等茶道家元为首的茶人们不懈努力的结果，也与日本政府大力扶持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是以茶道家元为首的茶人们与日本政府各司其职、官民通力合作的结果。首先，日本政府对茶道的发展助力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建章立制的扶持，而对茶道内容、修习方法、修习水平评定及证照的发放等微观层面内容则完全由茶道家元遵循传统礼仪做法自行建构判定。日本政府不仅将茶道作为“酷日本”等文化产业战略的主要内容予以保护、扶持和推广，如几乎所有茶道家元的府邸都被评定为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有形文化遗产而予以保护；而且在相关法律中对茶道予以明确定位，如日本政府 2017 年 6 月 23 日修订并颁布实施的《文化艺术基本法》把日本文化内容分为“艺术”“艺能”“生活文化”“国民娱乐”“文化遗产”五大类，其中第十二条规定“生活文化”的内容具体包括“茶道、花道、书道、食文化及其他与生活相关的文化”。其次，作为日本茶道家元自身的努力是日本茶道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推动力。日本茶道家元继承人为了能够胜任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之重责，为了能够继承弟子们敬服的家元之位，大多从幼年就要接受与茶道相关所有内容的严苛训练和学习。每一位家元大多都会用一生的精力来创立一套独具特色的传世点茶法。茶道家元一般被尊称为“宗匠”，例如日本茶道里千家第 15 代家元千玄室因其业绩卓著而被茶人们尊称为“大宗匠”。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茶道家元可谓日本匠人匠心的代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位日本茶道家元都有着作为日本文化代表的自负，不仅兢兢业业研磨茶道，而且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文化外交政策，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建构和维护日本国家形象的责任。在日本茶道家元中，虽然也有个别故步自封者，但更有像日本茶道里千家第 15 代家元千玄室这样胸怀世界的日本文化战略家，经常被日本政府聘任为制定国家文化战略的顾问委员。

反观中国，茶人们的精力大多倾注在茶叶产业的打造上，极力追求茶叶的健身养生功能，追求物以稀为贵的天价茶，甚至嗜茶者所谓的“口粮茶”往往令很多囊中羞涩者望而却步；对茶的文化属性探究往往流于编故事，最

终还是围绕茶叶的健身养生功能做文章，徘徊于形而下的层面，对茶的精神层面挖掘不够或走向其反面无端夸大其词。对如此缺憾之处，若不能及时更改，恐怕很难期待茶文化交流发挥重构新时代中日间文化认同路径的作用。

对于曾置身于茶道文化下游的日本而言，日本茶道对中国茶道进行本土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日本人建构其对华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当年的中国茶道，无论形式还是理念，皆为日本茶道提供了充分丰富的给养。从茶道里千家在中日茶文化交流中的表现亦可看出，日本茶道始终保持着对中国茶道的敬畏之心。日本茶道中有很多所谓的秘传点茶法，也即只能口承相传的点茶法。乍一听秘传点茶法充满了神秘感，其实只要是有机会认真修习一番就会发现，日本茶道中的各类秘传点茶法，其实是围绕中国唐代以来的各种器物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直白地讲，就宛若一套动作规范细腻严谨的中国古代器物护理使用技法大全。中国茶道未来依然有可作为之处，不需要妄自菲薄，但需要找准方向和方法，借鉴日本茶道发展相关经验，对中国茶文化发展不无裨益。

日本茶道作为《日本文化艺术基本法》中规定的“生活文化”，作为日本之美的综合载体，在日本国内充分发挥着教化功能，修习者借此修身养性，面向世界又成为日本政府以及如冈仓天心与各派茶道家元等文化精英们展示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媒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有选择性的，交流过程中既可能产生“文化冲突”或“文化认同”，也可能出现“文化反哺”或“文化反噬”的现象，这也是今后中日茶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中国作为世界茶道文化的故乡，在茶道文化的形式和理念上，今后该如何继续发挥引领日本茶道乃至世界茶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这些祈愿振兴中华茶文化、不断提振中华文化软实力者深思。

（责任编辑：陈梦莉）



unilateral external propaganda, but through equal dialogue and exchange to prevent false information such as lies from leading to national feelings and even war conflicts. The peace – loving forces and visionaries of China and Japan can completely break through the resistance,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pursue truth, clarify disputes, cooperate, promote officials with the people, and make efforts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cognitive dispute over the sovereignty ownership of the Diaoyu Island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 – Jap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Urasenke’s Contribution to China – Japan Tea Culture Exchanges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 – Japan Diplomatic Relations** *Zhang Jianli*

Abstract: Urasenke is the largest folk tea ceremony cultural group in Japan and even the world.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rasenk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cultural envoy in promoting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y carrying out cultural exchanges of tea ceremon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becomes a model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Japan relations by “promoting officials ties with the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 – Japan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for friendly exchanges, Urasenke has taken the lead in sending the “Urasenke youth boat” to visit China,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China – Japan youth exchanges. The tea ceremony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by Urasenke in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Hangzhou, Guangzhou, Dalian, and other cities all the year round,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conferences jointly organized by Urasenke, China – Jap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long with renowned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enriched the contents of China – Japan tea ceremony cultural academic exchanges.